



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

wanqing hunan xueshu sixiang shigao

王继平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HUNANRENMINCHUBANSHE

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

wanqing hunan xueshu sixiang shigao

王继平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王继平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12

ISBN 7-5438-3828-I

I.晚... II.王... III.学术思想-思想史-湖南省-清后期 IV.B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593 号

责任编辑:龙仕林

装帧设计:胡薇薇

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

王继平 主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字数:413,000

ISBN7-5438-3828-I
K·700 定价:33.50元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湖南学术的背景与传统

- (1)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学术思想演变..... (1)
- 第二节 嘉道之际学术思想变迁..... (10)
- 第三节 晚清湖湘学术传统及嬗变..... (24)

第二章 嘉道之际学术思想的嬗变..... (36)

- 第一节 唐鉴的学术思想..... (36)
- 第二节 陶澍的经世思想..... (61)
- 第三节 贺长龄、贺熙龄的经世思想..... (96)
- 第四节 汤鹏的学术思想..... (114)

第三章 咸同时期经世实学的发展 (上) (147)

- 第一节 魏源的学术思想..... (147)
- 第二节 曾国藩的学术思想..... (167)
- 第三节 左宗棠的学术思想..... (184)
- 第四节 郭嵩焘的学术思想..... (212)

第四章 咸同时期经世实学的发展 (下)	(236)
第一节 胡林翼的经世思想	(236)
第二节 罗泽南的学术思想	(270)
第三节 刘蓉的学术思想	(310)
第四节 吴敏树的学术思想	(329)
第五章 晚清湖南经学之式微与终结	(347)
第一节 王闿运的学术思想	(347)
第二节 王先谦的学术思想	(390)
第三节 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410)
第四节 皮锡瑞的学术思想	(447)
第六章 晚清湖南的学术文化	(468)
第一节 复盛于昔的湖南经学	(468)
第二节 经世资治的“当代”史学	(489)
第三节 开创先河的近代地理学	(505)
第四节 蹒跚起步的近代科技	(508)
第五节 鹤立晚清的人才群体	(510)
参考文献	(517)
后 记	(527)

第一章 晚清湖南学术的背景与传统

学术思想之嬗变转承，起伏迂回，藉时代潮流而推移奔放。然千里垂泻，自有滥觞源头；波涛汪洋，必有进趋方向。是以观察学术思想之发展变化，或见众流庞杂，端绪纷繁，而其终当须把握总体之动向，自可易见影响之结果，甚至尚可探测未来之趋势。嘉道之际，晚清中国正遭逢重大转变，湖南亦然。晚清湖南学术思想正处于这一转变之机，它不仅受清代学术演变的影响，亦深受湖湘文化传统学术的影响。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学术思想演变

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中坚，把它概括为“清代经学”，是符合清代学术历史实际的。经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因其对经典的不同理解和学术传承性的不同，以及统治阶级当时的政治、文化需要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西汉时期，汉武帝因“大一统”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与《公羊传》相糅合的今文经学遂成为学术的主流。西汉末年，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成为王莽改制的主要依据，故古文经学大盛。东汉时，今文经学又被立为官学，但处于“私学”的地位的古文经学由于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逐步兴旺并与今文经学并驾齐

驱。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遵古文家说，兼采今文说遍注群经，郑学大行而今文说衰。魏晋以降，学分南北，玄学风起而经学破碎。隋唐统一后，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折衷南北学，经学归于一统，今文说若潜流于地下，几成绝学。到了宋代，经学发展进入理学时代。宋代理学，实质上是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这种思潮的兴起，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学术上的原因。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建立了统一的王朝，因而也需要一种维护统一的思想。而注重讲纲常伦理的宋代理学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从学术上来说，佛、道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与儒家的思想发生了矛盾。于是，宋学接佛入儒，糅合了儒、佛、道之间的因素，以儒学的伦常为基础，融会了佛、道的因素，因而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北宋时，宋学有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四大派，而朱熹则是正宗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陆九渊提倡“心性”之学，与朱熹之学相违。但两派都以理气心性为依据，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元、明以来，王阳明之心学崛起并盛行一时，但程朱理学因得到统治者的提倡而成为官学，一直占据正宗学术的地位。^①

从学术演变之实际看，清代学术“卓然成一潮流”者，主要有汉学（古文经学）、宋学、今文经学三派。有清三百年间的学术演变阶段，大致如皮锡瑞所云：“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眚。说经皆

^① 参见王继平著，《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

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谷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经学。”^①

清初，适值“天崩地裂”的明亡之后。国家的乱亡，社稷的倾覆，民生的涂炭，个人的颠沛流离，接踵而至的巨变，震撼了一批正直的士大夫，促使他们在尘埃落定之时对政治、历史、学术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对封建末世种种弊端有深切的了解，对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更有切肤之感。他们痛定思痛，愤激地把明之覆亡归因于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天下生员，不能通经知古今，不明六经之旨，不通当代之务”^②。总结理学数百年发展历史及基于明亡的历史反思，跻身新朝的汉族官僚学者们一改晚明尊崇陆王之学风，重新强调程朱学说的正统地位。他们提出：“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③此风由张履祥、吕留良诸人开其端，经陆陇其辈而渐入庙堂，至熊赐履、李光地以朱学获官卿相而推波助澜。他们一方面积极向皇帝和满洲贵族鼓吹理学思想，传播儒家学术，推动清朝政权的儒学化进程，另一方面通过讲学论道，向士人和民众宣传程朱主敬躬行之学，缓和汉族群众的反抗情绪。“崇朱黜王”所以成为清初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还同康熙帝对程朱理

① 皮锡瑞著，《经学复盛时代》，《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1页。

② 顾炎武著，《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4，《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柯崇朴著，《四川道监察御史陆先生陇其行状》，《碑传集》卷16。

学的重视和抉择有着直接关系。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特颁谕旨，将朱熹由孔庙两庑先贤之列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清廷广为刊布颁行御篆《朱子全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经典依据，任何想取得科甲功名的人不读此书是过不了关的。程朱理学借助于清初统治者的政治力量，从宫廷到民间，遂形成一股复兴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这使程朱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程朱之说复行于世”^①，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有所谓“今之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学”^②。因此在有清一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一直高踞庙堂。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清初理学思潮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和学术原则，在理学学术发展史上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它对程朱学说的阐发，尤其是对主敬躬行的特殊推崇，在当时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以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遁居山野的明朝遗民则与之相应，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宋明理学施以最猛烈的批判，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明道救世”。顾炎武批判理学，是将理学分为古今，把古之理学纳入“经学”，而将今之理学归入“禅学”，认为两者都必须正本清源，“以务本原之学”^③。同时，他认为东汉古文经学既有通经致用的特色，又“学有本原”，而汉儒亦“尊节崇义，敦厉名实”，因此他十分推崇汉儒，以东汉的经学为指归，以改变当时的士风。黄宗羲也强调研究学术应该“要以六经为根底，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顾炎武等

① 陆陇其著，《周永瞻先生四书断序》，《三鱼堂文集》卷8。

② 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卷1。

③ 顾炎武著，《与周籀书书》，《亭林文集》卷4，《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页。

人通经致用的学术态度和注意探究本原的治学方法，在清初形成了颇有生气的汉学传统。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在这种学风的濡染下，应用“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的考据与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清代汉学的新局面，打破了宋学的独尊地位。同时，汉学家也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舆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顾炎武等人这些崇实黜虚、通经致用的主张，无疑为汉学在清代的复兴开了先路。但总的看来，清初学术思想尚属“汉、宋兼采之学”。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强化，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实行，到了康熙中叶以后，统治者对汉学也采取怀柔和高压的政策，对汉学实行牢笼钳制的方针，既开明史馆、设博学鸿词科在先，行拉拢之策；又大兴文字狱于后，取高压之手段。于是士人逐渐放弃汉学“经世致用”的宗旨，沉湎于古籍的考订和辨正，汉学开始向单纯的考据学方向过渡。阎若璩、胡渭就是这种学术转向过程中最具有代表的学者。他们继承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勤学苦钻、学识广博的特点，对古代经典进行了缜密而周详的考证，而摒弃了其“经世”宗旨。其中，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东晋梅颐所献、为唐宋以来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之伪。胡渭著《易图明辨》，考订宋儒信服的“易图”乃五代道士陈抟的伪作。他们开了辨伪学之先河，树立了考证的典范。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在阎若璩、胡渭等学者严密辨伪考证的影响下，理学的权威更加失坠，新的学术路径进一步开拓，学者

^① 顾炎武著，《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4，《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3页。

自然群起响应，趋之若鹜，汉学之兴已然指日可待。

清中叶在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继往开来，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清朝的统治在政治上空前稳定，经济上有长足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昌盛创造了条件。乾隆既重视武功，也强调文治，他命令在全国搜书、征书，编纂卷帙浩瀚的《四库全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时间，南北各地编书、校书、刻书蔚然成风，致使书院林立，学者辈出。加之当时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也迫使更多的学者埋头于对经书的训诂和注疏。此时的学者们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强调读经、重视实证、由文字音韵以通经的治学方法，更加崇尚汉代的古文经学，汉学至此到鼎盛而成为显学，风靡朝野。所以，汉学又往往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这一时期习汉学者蔚然成风，“朝士崇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①，形成“汉学专制”的局面。学者沉溺于古籍的整理，为考据而考据，并不关注社会现实，这正符合统治者禁锢人心的意图，因而也得到统治者的提倡。

乾嘉汉学以宗奉汉代古文经学为治学宗旨，在治学范围上以经学为核心，并旁及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辨伪、史地、典制、天算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无征不信”，且“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由于治学特点的不同，乾嘉汉学按其流派主要可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好博尊闻，崇奉汉儒；皖派则重精审，贵创造，“实事求是，

^① 陈康祺著，《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页。

不偏主一家”^①。两派风格虽不尽一致，但其总体学风都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②。当时学者皆以此种学风相矜尚，以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考据之风充满国中，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③。但是，无论吴派或皖派，虽然都奉顾炎武为祖师，却都只继承了顾氏的治学方法，而失去了顾氏的经世宗旨，成为为考据而考据的专门学问。因此，乾嘉学派的发展愈到后来，便愈成为脱离实际的学术。

乾嘉汉学的宿儒学者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无征不信”的方法，对儒家经典和古代文献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于儒家经典义理的研究贡献颇大。一批学术大师抉疑纠谬，匡古开新。特别是他们的治经实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亦有卓越建树，如经书的笺释，史料之搜补鉴别，典籍之辨伪、辑逸、校勘，文字的训诂、音韵，以及方志、类书、丛书之编纂、整理、刊刻上，皆做出了显著的成就。阮元编辑的《皇清经解》（刊于1829年）收录清代经学著作173种，凡1408卷，作者74家，集中反映了清代中期汉学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对此，梁启超评价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其学问之中坚，则经学也。经学之附庸则小学，以次及于史学、天算学、地

① 钱大昕著，《戴先生传》，《潜研堂文集》卷39，《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页。

② 钱大昕著，《戴先生传》，《潜研堂文集》卷39，《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页。

③ 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上），北京市中国书局，1987年版，第1页。

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等，一皆以此种研究精神治之。”^①可以说，乾嘉考据学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更新，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而此时，一直高踞学术统治宝座的程朱之学被人弃若敝屣，仅仅成为士子们科举入仕的敲门砖，一旦成功即弃之而转治它学。据昭槁《嘯亭杂录》记载：“自于、和当权后，朝士习为奔竞竞，弃置正道。黠者诟詈正人，以文已过，迂者株守考订，訾议宋儒，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余尝购求薛文清《读书记》及胡居仁《居业录》诸书于书坊中，贾者云：‘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费本耳！’”^②连一些宋学家如王白田、李穆堂等人也深受汉学考据风气的影响，以考证来讲义理。汉学大行，宋学几不成军，是清中叶学术的突出特点。

乾隆末年以后，清王朝由盛转衰，“太平盛世”已成明日黄花，整个社会呈现出政治腐败、经济衰敝、社会动荡的乱世景象，学者们再也不可能“镇日书帙校勘劳”了。汉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已不复存在。而同时，在空前的社会变动面前，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汉学由于失却了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治学宗旨而显得苍白无力，其“烦琐碎裂”、“不适于用”的流弊暴露无遗，大批士人皓首穷经，不问世事，于国计民生，渺不相涉。时代呼吁新的学术思潮和学术流派的出现，晚清今文经

①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② 昭槁著，《书贾语》，《嘯亭杂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7~318页。

学是在纠正乾嘉汉学的学术弊端，重倡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中得到复兴的，对晚清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文经学在清代复兴，以江苏常州为中心。庄存与首倡于前，经其侄庄述祖传衍，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而大张其帜，极力阐发今文经学所谓的“微言大义”。他们治经不拘汉、宋之门户，注重剖析疑义。他们批评汉学家“详训诂”而“略微言”，认为其忽视了经学的真义。对于宋学讲义理性命，恪守宋儒，他们也表示不满，认为于世无补。他们主张，“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①，注重发挥“微言大义”，取法致用。他们十分推崇西汉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与何休，认为二人“于圣人微粤旨，推阐于密”^②，得到了经学的真谛。他们尊奉《春秋》，独尊《公羊》，因为《春秋》中包含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而此种“微言大义”又存乎《公羊》之中。他们所阐发的“微言大义”，实际上就是“通三统”，“张三世”的改制思想。刘逢禄在《春秋公羊何氏注释例》中便发挥了这种“通三统”、“张三世”的思想，认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统，三代制度各有因革损益。因此，阐发《春秋》大义，乃可以取法致用，回复“三代之治”^③。论学术史者，或因此一学派所治之《春秋》公羊学而称之为公羊学派，或以其郡望命名而径呼常州学派。常州学派对晚清学术发展最显著的影响是它的“经世之学”。从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出发，主张治经、治学不要拘泥章句，一以经世为指归。在经世的前提下，为了经世的需要，阐发

① 阮元著，《庄方耕宗伯说经序》，《味经斋遗书》卷首。

② 刘逢禄著，《春秋公羊释例序》，转引自王继平《转换与创造——中国近代文化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③ 刘逢禄著，《十七诸侯终始表序》，《刘礼部集》卷4。

“微言大义”。

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常州学派所提倡的“春秋公羊学”，仍属于学术上反东汉古文经学而向西汉今文经学复归，远未能将“今文经学”引向现实政治，使之成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然而把今文经学变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变革的锐利思想武器者，则是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和魏源。龚、魏是社会历史转折时期涌现的杰出思想家、经学家，他们曾师事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他们发展了刘、宋“通经致用”的活泼学风，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既鄙弃一味训诂古籍的汉学，也藐视空论心性的宋学，诚所谓“恶夫以短钉为汉，空腐为宋”^①。魏源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龚、魏在今文经学的大纛下，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开启了晚清明道救世、变法改革的时代先风。

第二节 嘉道之际学术思想变迁

乾隆六十年（1795），湘黔苗民和川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爆发，给“承平六十年”的“乾隆盛世”划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清朝的历史由此滑向嘉、道以降的“衰乱之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政事如河政、如漕政、如盐政，以及吏治、财赋、戎政，无不积弊丛生。从而导致了1796年川楚地区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转战五省，历时九年；1813年，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乃至率众直闯紫禁城，严重地威胁

^① 魏源著，《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1页。

了清王朝的统治；嘉道年间，英国侵略者除在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加紧鸦片走私活动外，还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武装叛乱。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说：“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拒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如箠仕京师。”^① 伴随着世运的潜移，学术思潮亦发生着巨变。曾极一时之盛的乾嘉汉学显得苍白无力，渐失昔日盛势而趋向偏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种“繁称杂引，游衍不得所归”的繁琐考据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史传中脱身出来，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清政府也已无力再继续保持清前期那种思想文化上的高压专制政策，乾隆末年曾明令禁止文字狱，嘉庆又曾下谕广开言路，这为人们研究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诚如梁启超所言：“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②，士人可以“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以今文经学为武器的新的经世致用学风再度昂扬起来，并蔚然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潜心考据的汉学家开始关注风俗人心，颂法程朱的理学家也讲起经济事功，并出现了善于用危言耸动舆论的今文经学派。学术自身的嬗变与社会转型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以适应新的时代。于是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崛起的新的学术思潮，代表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变迁。

① 魏源著，《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一、汉学的衰落和汉宋调和

早在乾嘉汉学显赫一时之际，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就对汉学泥古守旧、脱离实际的流弊提出了批评。后来，乾嘉汉学弊端日益严重。更有甚者，一些士人把汉学作为追逐利禄、附庸风雅的工具，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竞词章，质者研考据，风气既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以食色为己任，廉耻为虚名，搜利禄为贤才，穷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风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官籍籍，乘此而起。”^①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些对社会危机有深切感受，要求改变现状的进步思想家，痛感终日将时间精力消磨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之中，对于时事政治、国计民生不闻不问的乾嘉汉学，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障碍，大声疾呼要求改变学术风气。魏源指出：“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瓠析”，“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也“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有奋志讲求抱负宏远之人，反群笑为迂阔”，其恶果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终生埋首考据的学者也已认识到乾嘉汉学这种学术路径于世无甚裨益的弊端。如段玉裁在晚年，感慨自己一生“喜言训诂考核”，是“寻其枝叶，略其本根”，最终落得个“老大无成，追悔已晚”^③。一代考据大师的慨叹，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学术转向的大势。以后，虽然也还有少数学者沿着乾嘉学派的治学途径，在学

① 潘德舆著，《养一斋集》卷，同治十一年山阳潘氏刻本。

② 魏源著，《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8~359页。

③ 段玉裁著，《朱子小学恭跋》，《经韵楼集》卷8。